

# 非农化视角下的浙江省农村社会分层

刘成斌 卢福营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均质同构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被打破,尤其是在较发达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充分。浙江省10个村庄的职业分层、收入分层和消费分层状况表明,农村社会的分化变迁与其非农化水平密切相关,由于非农化水平的差异,当前农村社会的分层呈现出多元化、非均衡性、非充分性等特征。从分层总体结构上看,浙江省农村社会的“橄榄型”阶层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关键词】** 非农化 浙江省 农村 社会分层

**【作者】** 刘成斌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讲师;卢福营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社会结构本质上是经济结构的社会反映和表现形式,其普遍表现为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均等分配状态,呈现出社会的一种结构性不均衡。社会学家通常通过一定的指标把社会资源占有不同的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描述出来,这就是社会分层。传统的社会分层理论分为两大派:(1)主张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社会阶层的马克思主义学派;(2)主张采用财富、声望和权力多指标体系来划分的韦伯学派。现代的社会分层理论形成三大派:(1)主张用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来划分;(2)主张用职业声望作为主要指标来划分;(3)主张以人的消费嗜好或偏好来划分。这些分析视角各异的理论,分析的学科对象是相同的,即社会事实上的阶层体系,而且这一阶层体系是客观存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不同分析视角得出的分层结论是否一致?本研究运用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结合浙江省农村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实际,围绕非农化这一主线,依据对浙江省10个村庄的实证调查资料,分别在生产领域的职业分层、分配领域的收入分层、消费领域的日常消费分层和房屋分层方面选取指标,对浙江省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分层研究。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农业对应于“村”,工业对应于“城”。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发生了重大的非农化变迁,“村”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工业、商业,“村”在产业和经济结构上具有了“城镇”的意义,浙江省农村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参照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的概念,我们依据村庄的非农化类型与程度把浙江省农村分为传统农业村、工业村、镇村和城村4个类型。在本研究中,农业村是传统中国农村村庄的代表,是参照类型;工业村是走工业化道路而实现非农化的村庄,它是工业和企业制度与村落社会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村庄,经济实力雄厚;镇村是坐落在小城镇的村庄,依靠地理位置的优势尤其是交通优势,通过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城村是处于城市近郊或城乡结合部的村庄,这类村庄的非农化道路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少原来的村庄在城市扩张中被并入到城市,但其社区管理体制和人员管理办法并未完全纳入城市管理体系,由此形成

为一种独特的非城非乡的过渡型社区。这4种村庄类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但并不排除每一具体村庄内完全没有其他村庄类型的特征,只不过主要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分化特点符合我们提出的理想类型。

本研究先根据村庄非农化类型与程度在浙江省选择10个样本村,它们分别是:金华市婺城区鲍杨村和白龙桥镇洞溪村,义乌市上溪镇派溪头村和山坞村,嵊州市长乐镇尤家村和五村,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新桥头村、宁围镇新安村和丰北村,永康市芝英街道横沿村。其中,农业村3个,工业村2个,镇村2个,城村3个。然后在每个村中按户口薄以户为单位进行分层抽样。在每个村的抽样中,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也考虑到一些农村社会成员外出不在家,我们一般都要找到比较了解村庄情况的村会计,由其依据村民富裕程度,分成较好、一般、较差三种人群,然后在三种人群中分别抽取1/3的样本。当然,由于村庄规模大小不一,本研究对各村具体的样本规模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调查于2004年1~5月进行,调查对象是户主或其配偶,共调查了351户,共有劳动力966人。

## 一、生产领域的社会分层:职业分层

### (一) 职业多元化、非农化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许多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了转换职业身份的新机会。他们或者离开村庄到城里去寻找理想的职业,或者“离土不离村”、就地转换身份走上非农化道路。在农村社会这一非农化变迁过程中,农村社会成员改变以往单一的种植劳作,从事多元化生产经营的趋势日益显现。根据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其分为9个职业阶层:(1)农业劳动者,主要是指承包集体土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以农业劳动和农业收入为主的劳动者构成的群体。(2)第二产业劳动者,主要是指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产业劳动,户籍仍在农村,但主要收入不是来自农业,而是务工。(3)第三产业劳动者,主要在城镇的商场、宾馆、娱乐场所或乡村第三产业部门务工。(4)农村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一定的专业技能,被人们称为“农村专业技术人员”或“智力型职业者”,如民办教师、乡村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等。(5)农村管理者,主要指乡镇(村)企业的管理者(企业的经理、厂长及主要科室领导)和农村基层干部。(6)私营企业主,是指兴办和经营私营企业的农村社会成员。(7)个体劳动者,主要是指拥有一定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为基础,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经营小型工、商、服务业,劳动成果归个人占有和支配的群体。(8)兼业劳动者,该阶层从事两种及以上的职业,收入来源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农村社会成员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向其他非农行业转移的过渡阶层。(9)无业人员(见表1)。

表1 家庭成员的职业分布状况

职业	人数	百分比
农业劳动者	277	28.67
第二产业劳动者	184	19.05
第三产业劳动者	229	23.71
农村知识分子	39	4.04
农村管理者	29	3.00
私营企业主	26	2.69
个体劳动者	108	11.18
兼业劳动者	66	6.83
无业人员	8	0.83
合计	966	100.00

我们对浙江省10个村的调查表明,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多元化、非农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 村庄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布。从表1可看出,在调查样本中,真正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劳动的不到三成,而且主要集中在比较传统的农业村中。也就是说,70%以上的农村社会成员已经不再以土地经营为主,成为非农化劳动者。

2. 家庭成员职业的多元化。职业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家庭劳动力彼此之间职业的差异性和多样化。从表2可以看出,有4个及以上劳动力的家庭,从事同一

职业的只占 1.83%。有 3 个劳动力的家庭,从事同一职业的比例也非常低,仅有 2.86%。有 2 个劳动力的家庭,从事同一职业的有一定比例,但主要是从事第一产业的专业种植、养殖,比如夫妻共同种植蔬菜,或共同经营花卉或苗木等。

3.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多元化。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多元化、非农化,势必导致其收入来源的多元化、非农化。从表 3 可看出,农村社会成员主要收入来源仍是种植业的只有 13.1%,即使这一小部分从事种植业的农户,其收入来源也呈多元化趋势。

(二) 职业非农化的特点

1. 职业非农化过程中以就地实现非农化、职业多元化为主。在我们调查的 10 个村中,除了 3 个农业村外流人口数量比较大以外,城村、镇村、工业村人口外流量均较小,以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为主。例如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的新安村、丰北村,村民除种植苗木外,主要是在本地经商、务工,或经营个体、私营企业;嵊州市长乐镇五村也是如此。

2. 工业、商业、饮食服务业与商品性农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在这次调查中,第二、三产业劳动者、个体经营者占调查样本总体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19.05%、23.71% 和 11.18%。

3. 农村社会成员兼业情况逐渐普遍。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不是从事单一的职业,他们在从事种植业或养殖业的同时还从事个体经营、服务业等。农业村的劳动力主要在建筑、手工加工、人力三轮车夫等行业兼职。这些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都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于亦工亦农。兼业长短因家庭劳动力的多寡与劳动收入的高低而不同。一般而言,家庭劳动力较多、从事非农劳动的收入又较高的,在外工作时间就长,反之则短。

4. 不同类型村庄非农化方式有明显差别。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农业村的非农化以外出打工或手工加工为主,城村和镇村以从事第三产业和个体经营为主,工业村则以从事第二产业劳动为主。

(三) 职业分层状况

从一定意义上说,阶层是社会结构序列中具有某方面相同性质的人群团体的统称。由于社会结构的排列次序不是惟一的,所以划分阶层的标准就具有了多变性。区分阶层常常只是为了某种需要突出某一人群有别于其他人群的特殊性,这样,分层的标准就会因研究目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当前浙江省农村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化主要是通过职业及其相关内容的转换而发生的。具体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城乡产业结构的调整

表 2 家庭成员职业多元化情况

家庭成员	2 个劳动力的家庭		3 个劳动力的家庭		4 个及以上劳动力的家庭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职业相同	95	55.23	2	2.86	2	1.83
职业不同	77	44.77	68	97.14	107	98.17

表 3 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主要收入来源	户数	百分比	主要收入来源	户数	百分比
打工	87	24.8	种植+打工	5	1.4
个体经营	61	17.4	个体经营+工资	5	1.4
种植业	46	13.1	包工程	5	1.4
工资	41	11.7	村补贴	5	51.4
运输业	19	5.4	房租+工资	5	1.4
经商	13	3.7	儿子供给	4	1.1
办厂	12	3.4	种植+个体经营	3	0.9
房租	7	2.0	养殖业	3	0.9
个体经营+打工	7	2.0	退休金	3	0.9
个体经营+房租	6	1.7	其他	8	2.3
种植+工资	6	1.7	合计	351	100.0

注:种植业包括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如花卉、苗木、葡萄、桃子等)。

和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引起了相当部分农村社会成员职业身份的非农化转换,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地位差别和利益不同,产生了阶层分化的新结构与新形势。

我们以家庭收入中占最主要地位的家庭成员为对象,分析其职业在收入上的分化情况,结果表明,均值比较呈现出显著差异(见表4)。

表4 不同职业在家庭总收入上的均值比较

	家庭第一成员		
	均值	户数	标准差
第一层			
私营企业主	197500	8	184913
第二层			
个体户	54717	46	103533
第三层			
农村管理者	54056	18	48278
第四层			
第三产业劳动者	46544	57	54818
第五层			
农村知识分子	45733	15	13264
第六层			
第二产业劳动者	37281	32	27465
第七层			
农业劳动者	32471	128	49812
第八层			
兼业劳动者	31381	42	29297
第九层			
无业人员	6730	4	7554
F=7.392	Sig.=0.000	Eta=0.384	

表5 收入情况统计(N=351)

	家庭年 总收入	人均年 收入	劳动力年 平均收入
平均值	42592	10911	16630
中值	25500	6667	10000
众数	30000	5000	10000
标准差	65760	15362	27240
全距	698000	149500	349444
最小值	2000	500	556
最大值	700000	150000	350000

表6 收入分层情况

	家庭总收入		人均总收入	
	户数	百分比	户数	百分比
上层	70	20.0	59	16.8
中上层	59	16.7	82	23.4
中层	61	17.4	65	18.5
中下层	89	25.4	99	28.2
下层	72	20.5	46	13.1
合计	351	100.0	351	100.0

## 二、分配领域的社会分层:收入分层

### (一) 家庭总收入、人均收入及其分层

收入分层是最基本的社会分层之一,它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狭义的,按工资收入分层;另一类是广义的,按总收入分层,除了工资,还包括养老金、福利收入、投资利润、储蓄利息、租金等。本文的收入分层是广义上的收入分层。

考虑到本研究中所统计的数据是农村社会成员年总收入而非纯收入指标,所以我们在其分组层次上做了一些相应调整。从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平均值来看,这次调查的农村社会成员家庭总收入达到42592元,人均收入达到10911元(见表5)。据此,我们对农村家庭总收入的分组值确定为10000元及以下为下层,10001~20000元为中下层,20001~30000元为中层,30001~50000元为中上层,50000元以上为上层;农村社会成员的人均总收入的分组值则确定为2500元以下为下层,2501~5000元为中下层,5001~8000元为中层,8001~15000元为中上层,15000元以上为上层(见表6)。

从调查结果看,被调查者的经济收入结构已逐渐趋向于“橄榄型”。“橄榄型”结构意味着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较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当今世界的许多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庞大的中间阶层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的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禀赋能力差异和社会对效率的选择性激励,所以人们之间的富裕与贫困必然相对地存在,正是人际效用比较所体现出的正常差异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差异的拉大有一定的限度,一般认为,“橄榄型”才是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浙江省等发达地区农村无疑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橄榄型”社会结构在这些地区率先形成,无疑将起到示范效应。

### (二) 收入差距分析

从家庭总收入统计的全距来看,家庭总收入最高与最低相差69.8万元,人均收入最高与最低相差

14.95 万元。为了在更准确意义上说明农村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程度,我们对其基尼系数进行计算和分析。我们采用分户数据计算基尼系数,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按户总收入排序按户计算基尼系数;二是按每户家庭的人均收入排序计算基尼系数。前者的计算结果为 0.532,后者的计算结果为 0.499。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在 1984 年为 0.30,到 1995 年已上升至 0.415。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6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 0.424,1997 年是 0.425,1998 年是 0.456,1999 年是 0.457,2000 年是 0.458,2001 年是 0.459(魏雅华,2004)。早在 2000 年,李强(2000:184)在相关研究报告中就指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他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速度较快,到了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从改革前的绝对平均变成了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的水平。

根据这次调研数据计算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农村社会分化过程中呈现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显著。也就是说,根据家庭总收入与人均收入水平来分析,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层结构在人数结构上呈现为中层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结构,但在财产结构上却贫富差距较大。为此,我们必须考虑农村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承受力问题。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社会成员对当前这种贫富差距满意的只有 4.8%,相信这种贫富差距趋势将缩小的只有 6.3%。这与 1997 年 10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全国进行的 5 万多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结果是:90.4%的人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认为差距适中的只有 7%(李强,2000)。可见近年来人们对中国贫富分化有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这种认知和感受不利于社会整体心态的整合,对社会秩序、社会安全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同时应当指出的是,本研究认为阶层分化与平等性是不同的概念。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实行优胜劣汰本身也是一种平等的体现,绝对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平等,确切地说是“不公平”。本研究表明,农业村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程度较低,而非农化程度较高的村庄其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程度较高,这说明当前农村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的不均衡性,而且这种非均衡状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化和社会转型相关。根据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和市场机制的调节规律,当市场转型达到较为完善的阶段,市场体制和政府宏观调控机制比较健全的时候,基尼系数将会下降。这必然要求政府在全社会建立和完善与市场转型相应的配套体制,具体包括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贫困者的救济制度、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累进税制度等。

### 三、消费领域的社会分层:日常消费分层与房屋分层

职业大体上能够反映出人们的社会地位,但职业内部的分化也十分严重。在浙江省农村非农化过程中,职业多元化和市场多元性使得在同样职业的具体个人之间的社会地位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的基尼系数等收入差距分析并不一定意味着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当程度上即使同职业同地区,其内部的差异也是十分显著的。就分配领域的分层而言,收入中首先碰到的难题就是人们是否真实说出自己的收入水平,我们调查的数据都是根据调查对象报告而得知的,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调查员的观察给予一定的鉴别,但不能排除调查对象有意的隐瞒;另外,我们用的是家庭收入概念,那么个人收入概念层次上的收入分层是否与我们的调查结论一致,再者同样收入的社会成员其社会地位、生活质量也有一定的差异,因此我们进行第三种分层——消费领域的社会分层。

#### (一) 日常消费额分层

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人均消费水平总体平均数为 4945 元,众数为 5000 元,最小值为 500 元,最大值为 60000 元。综合诸种日常生活消费,按消费值将农村社会成员的日常消费做成一个总体的消费指标,并据此把农村社会成员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 5 个层次。我

们确定了6000元、4500元、3500元、2500元为划分标准,6001元以上为上层、4500~6000元为中上层、3500~4499元为中层、2500~3499元为中下层、2499以下为下层。从表7可看出,分层结果呈现出“橄榄型”结构。

表7 人均日常消费额分层情况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合计
户数	79	65	44	97	66	351
百分比	22.5	18.5	12.5	27.6	18.8	100.0

### (二) 日常消费水平分层

李培林、张翼(2000)指出,由于中国的税收和财产申报等制度尚不健全,个人与家庭收入是各种调查中最难以厘清的领域。隐性收入及地下经济的大量存在,使常规的收入统计

和调查很难准确真实地反映实际状况。虽然居民储蓄中存在着公款私存和私人资本金混存的现象,但隐性收入的大量存在是造成收入指标失真的主要原因。一般估计,隐性收入平均可占到个人收入的3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为了论证收入分层和日常消费额分层,我们在研究中另外选择了日常生活消费指标进行社会分层。

众所周知,恩格尔系数是国际通行的衡量消费水平的指标,也是消费分层的划分依据。国际上根据恩格尔系数确定了一个划分贫富的标准。该标准是:0.30以下为最富裕阶层,0.30~0.40为富裕阶层,0.40~0.50为小康阶层,0.50~0.60为勉强度日阶层,0.60以上为绝对贫困阶层(李培林、张翼,2000)。2002年浙江省农村社会成员人均消费性支出3693元,其中食品支出1508元,恩格尔系数为0.408(浙江省统计局,2003)。本研究考虑到所调查的农村经济发展程度总体上处于全国先进水平,而前面所作的分层均采用了5个层次划分,为保持分层的前后连贯,在日常消费水平分层上我们也进行5个层次划分。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分化的阶层结构仍然属于“橄榄型”(见表8)。

### (三) 房屋分层

1. 房屋面积分层。本研究首先依据被调查者房屋面积的大小进行分层。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人均拥有的房屋面积为68.06平方米,而且不同层次收入水平的农村社会成员其房屋拥有量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分别以35、50、70、100平方米为界将农村社会成员分为5个层次(见表9)。我们认为房屋面积差异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因为在中国农村,购买或建造房屋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全部家庭成员集中整个家庭的财力、物力共同进行的。所以,以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而不是以单个家庭成员的月收入水平作为统计指标,更符合客观事实。统计分析也表明,房屋面积与家庭人均收入之间相关关系显著( $\Gamma=0.276, \text{Sig.}=0.000$ )。

2. 房屋价值分层。随着市场机制效应的扩展,农村社会成员对房屋的市场价值越来越关注。根据调查,依据房屋的地理位置、结构功能及市场化程度,我们将农村的房屋分为门面兼住房(个体经营等商业门面与居住一体)、出租为主居住为辅、居住为主出租为辅和单纯居住四类。

表8 恩格尔系数分组

	上层 (0.3以下)	中上层 (0.3~0.4)	中层 (0.4~0.5)	中下层 (0.5~0.6)	下层 (0.6以上)	合计
户数	64	90	87	47	63	351
百分比	18.2	25.6	24.8	13.4	17.9	100.0

表9 人均房屋面积分层

	上层	中上层	中层	中下层	下层	合计
户数	68	66	77	68	72	351
百分比	19.4	18.8	21.9	19.4	20.5	100.0

应该说村庄非农化程度越高、房屋的地理位置越有利于市场商业经营;结构功能越完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价值也就越高。调查中,我们对被调查者拥有的房屋进行了价值测算,并按测算结果将其分为5层(见表10)。

3. 房屋分层的意义。我们调查发现,不少农村社会成员已不再将建设房屋作为单一消费资料,而是作为

表 10 房屋价值分层

	下层 (2 万以下)	中下层 (2 万~9.9 万)	中层 (10 万~14.9 万)	中上层 (15 万~19.9 万)	上层 (20 万以上)	合计
户数	76	77	39	73	86	351
百分比	21.7	21.9	11.1	20.8	24.5	100.0

重要的投资渠道,这在外来务工人员众多、房屋出租市场发达的村庄已成为较为普遍的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说,房屋已部分地转变为经营资本。可见,房屋已经成为浙江省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本文不使用传统的“住房”概念,而改用“房屋”概念,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浙江省农村的现状。这也提醒我们: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房屋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在当今浙江省农村的部分村庄,房屋不仅是用于自己居住的住宅,而且也是可以用来出租或办厂开店、从事生产和经营的。所以,房屋不再仅仅是一种消费资料,而且也是一种生产资料。

####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职业、收入、消费等不同阶层划分方法对浙江省农村社会成员进行阶层划分,所得阶层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均为“橄榄型”阶层结构。这一方面说明浙江省农村社会在非农化过程中,社会成员正在发生着多元化的分层变迁,另一方面也说明以中间阶层为主流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浙江省农村社会中形成,相对稳定的阶层结构逐渐显现。

应当肯定,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但职业分化、非农化是推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成员阶层分化变迁的根本动力。农村社会的多元分层,首先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职业身份的多样化。在非农化过程中,农村社会成员实现了多元化的转移和流动,由此导致了职业身份的转换,进而因职业的不同逐渐分离为多个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阶层。非农化过程中发生的这种农村社会多元分层,势必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在非农化发展进程中,农村社会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形成了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化的非均衡格局,村庄差异拉大,造成农村社会分层水平和模式的村域差别,型塑农村社会分层的村域特色。这意味着村籍将有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农村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

房屋分层已经成为当前浙江省农村一个凸显的现象。房屋分层提醒我们,对于农村社会成员而言,房屋不再仅仅用于自己消费,已成为其用于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制定农村特别是城村、镇村居民建房政策时,务必考虑这一情况。农村社会成员赋予房屋的这一崭新意义和功能,对于缺乏生产资料 and 经营资本,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具有不可小视的现实意义。事实上,中国需要通过“侵占”农村的利益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同时国家又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农村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这就需要给农村社会成员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与城市社会成员同等的发展空间和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承认农村房屋的生产资料 and 经营资本属性,允许农村社会成员经营房屋、扩大房屋投资,实现自主就业和发展,无疑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 参考文献:

1. 魏雅华(2004):《贫富的底线》,人民网([http://www. people. com. cn/GB/jingji/2797824. html](http://www.people.com.cn/GB/jingji/2797824.html))。
2. 李强(2000):《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鹭江出版社。
3. 国家统计局(2003):《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4. 李培林、张翼(2000):《中国的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5. 浙江省统计局(2003):《浙江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涛)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chnology change of firms tends to be skill-biased,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therefore it might contribute to relatively increased demand for skilled workers and their income increase. In addition, our results provide an alternative answer to the coexisting phenomena of the shortage of skilled workers with the shortage of labor force.

**Motivation and Employment of Wage Rising to Laborers: An Employment Model Differing from Keynes Employment Theory**

*Yang Junqing* • 54 •

The Keynesian theory deals with the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under the hypothesis of wages rigidity, suggesting that raising price and reducing the real wages can only be valid in a short-term.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wage rise-employment model differing from Keynesian employment theory, suggesting that enhancing monetary wages can impress workers as real wage increase, and therefore stimulate labor supply and capital/output ratio through increasing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r. This mechanism will have the long-run effect on solving unemployment problem.

**Revisit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mployment Priority: A Perspective of Technical Progress**

*Zhang Zhiyong* • 58 •

By analyzing two typical forms of technical progress—frontier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adoption of applied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echnical progress brings about economic growth but tends to reduce employment, which makes employment expansion unable to catch up with economic growt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mportance and priority should be emphasized employment while choosing technology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Urbanization As Driving Forc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Li Tongping Cheng Jinhua* • 65 •

Using time series data since 1980 and cross-section data in 1990 and 2000, this paper compares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on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investment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utweighs the consumption effect, which worsens the situation of high-investment with low-consumption.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as well.

**Economic Analysis on Traditional Demographic Behavior: Theories and Empirics**

*Chen Jiping* • 70 •

This paper creates a demographic-economic model considering the role of human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which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demographic-economic models that are only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unctions of population. The equilibrium results of the model show tha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property rights, peasant controlled family size at a "population-pressure" level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best level in production optimization. This conclusion is verified by historical data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ize and activities of clans as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to protect property righ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tructure of Village Hierarchy of Zhejiang Province: A Non-agricultural Perspective**

*Liu Chengbin Lu Fuying* • 75 •

The structure of village hierarchy has witnessed a greatly disparity since economic reform, particularly in the relatively developed regions. A case study on the differentials in occupation, income, and consumption in ten villages of Zhejiang province show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hanges and non-agriculturalizatio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village tends to be diversified, imbalanced, and deficien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non-agricultural patterns. The stratum of olives structure of the village society of Zhejiang is emerging.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Structure Change on Poverty: Analysis on Household Data in Rural Ningxia**

*Yang Guotao Meng Lingjie* • 82 •

Based on the Shapley value method, this paper describes changing trend of rural poverty in rural Ningxia during 1984-2004, focusing on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structure change on poverty. The main findings are that income generated from family business has contributed the biggest but declining part to poverty alleviation, while wage income became the main factor to reduce poverty in recent years. Property income and transferred income have played little role in reducing poverty.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Integrated Reform of Family-planning Program**

*Jin Xiaotao* • 89 •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planning has made a great achievement since it launched five years ago. Further efforts are needed in the period of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to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ystem and to recreate a good population environment for the goal towards a well-being and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